



神秘的鼯鼠

——
国际间谍战

让-玛丽·蓬托等著

816

神秘的鼯鼠

——国际间谍战

〔法〕让—玛丽·蓬托等著

火正德	赵立兴	罗汉苏	译
龚元兴	刘红燕	李福顺	
王雁芬	朱邦造		
杨桂荣	谢燮禾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 政

神 秘 的 曝 光

——国际间谍战

〔法〕让-玛丽·蓬托等著

火正德等译

杨桂荣等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内大街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 开本 印张：4.5 字数：89,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0

书号：3003·1624 定价：0.38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根据法国《问题》周刊一九八〇年七月至九月连载的九篇文章编译而成的。这些文章披露了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若干起重大国际间谍案件的内情，例如曾轰动一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纪尧姆事件；同时也介绍了苏联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东、西德、以色列、法国等情报机构的组织和它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况。这对帮助读者了解国际上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也许有所裨益。当然，这些文章所反映的观点只能供读者参考。在翻译过程中，对某些同实质内容无关的文字略作了删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目 录

- 一、神秘的鼯鼠让—玛丽·蓬托 (1)
- 二、两个德国的间谍战皮埃尔·德格罗普 (15)
- 三、纪尧姆事件乌尔苏拉·岑特施 (27)
- 四、深闺谍影安德烈·昂西安 (45)
- 五、活跃在第一线的以色列女间谍
.....于里·当、克洛德·邦让 (58)
- 六、辛西亚的狂热史约翰·阿德 (73)
- 七、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的
 一次谈话皮埃尔·德格罗普 (88)
- 八、中央情报局、克格勃与法国国外情报和
 反间谍局皮埃尔·德格罗普 (106)
- 九、法国情报机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皮埃尔·德格罗普 (121)

一、神秘的鼯鼠

让—玛丽·蓬托

故事是从某一个间谍开始的。那是一个既无名又无姓，不露真像的人物。人们至今仍拒绝透露此人的身份，甚至连已收留这个苏联叛逃者的国家也不肯予以泄露。这是战后苏联叛逃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军官曾被认定要当苏军的参谋长。但由于他同妻子离了婚，猝然感到自己前途渺茫，于是就带上情妇跑到西方，并向西方提供情报。他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和盘托出，使得西方各国参谋部不寒而栗，法国特务机构也大为震惊。此事发生于一九六三年。

这个原苏联空军上校悄悄地说：“在巴黎，克格勃有个高级间谍。他已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机构的各项决策透露给克格勃了。”在一个密室里，审讯专家们络绎不绝，想方设法向这个隐名埋姓提供情报的人挤取情报。他说：“我不知道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他二十年来一直在出卖法国……”。

法国本土警戒局的人员为之愕然。在美国人还没把这位絮絮叨叨的避难者弄到手之前，法国本土警戒局的人员匆忙跑来听取他所提供的情报。他们发现，大量列为“绝密”、“国防机密”的文件已转手易主了。

这个“鼯鼠”到底是谁呢？应该立即设法隔离这个能接近最高机构的人。

要想很好地理解当时法国人极为难堪的心情，就应了解下述事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戴高乐曾两次要求肯尼迪同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建立集体领导，但两次都遭到拒绝。苏联叛逃者将给美国人提供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从一九四三年以来，你们法国方面就有人叛变了。”由于机密被泄露，西方国家不得不花了三年时间来重新调整它们的军事部署。

在一九六三年，只有戴高乐将军和内政部长罗歇·弗雷两人知道本土警戒局正在严密审查和核对那些被做了手脚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的传送过程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凡是能接触这些文件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怀疑。经过几天的核实、查对，搜索圈缩小到国防部总参谋部。

每个人都受到严密的审查。审查后，侦察者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了“情报处”，因为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经过这个处。“情报处”有二百多名工作人员。本土警戒局于是就使用分析机器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审查。最后，只剩下了十六名可疑分子。侦察者又从这十六人中保留了四个人，其中必有一个是作案者。这四个人中有三个是高级军官，一个是文职人员。他们的朋友、熟人及同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以各种借口叫来介绍这四个人的性格与特点。

事情的确十分蹊跷。严格的调查表明，这三个军官不论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或是他们亲人的生活，几乎都有某些不清不白的问题值得怀疑。唯独那个文职人员乔治·帕克却无懈

可击。帕克四十九岁，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索恩河畔夏龙地区的一位理发师的儿子。他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闻处的工作。帕克身材矮胖，和蔼可亲，文质彬彬，擅于辞令，话锋犀利，风趣幽默。他被认为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曾支持阿尔及利亚归属于法国的主张。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一九六一年当得知法国将军们在阿尔及尔搞的军事政变失败时，他不禁嚎啕大哭。表面上看不出他是一个叛卖祖国愿为苏联效劳的人。但是，有一位受到询问的帕克的熟人向负责这一调查的马赛尔·夏莱局长偶而说道：“帕克支持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吗？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十分自由化的。”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闻处工作的法国官员乔治·帕克。

这一细微的心理矛盾使马赛尔局长很感惊讶，于是便对帕克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最后警察终于发现了破绽。八月十日，帕克带着一个相当沉重的黑色公文包，离开了面对树林的住所，登上一辆去圣·拉扎尔的公共汽车。下车后，他乘火车直抵凡尔赛，然后又改乘公共汽车来到伊夫林地区的一座小城市弗什罗列。帕克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引起了跟踪在他后面的本土警戒局的密探的高度注意。他们已注意到帕克在阴沉多雨的夏日里独自踽踽在大街上，而他的雨衣却搭在胳膊

上……真怪。

雨中，一个心不在焉的行人向帕克迎面走来，这是本土警戒局的一名密探。另一名密探正在篱笆后面拿着一个摩托车轮胎的气门在吹气，还有一位在一家小咖啡馆发黄的窗帘后面喝着葡萄酒的人也是他们的同事。

当帕克钻进一条小巷，围着一片房屋转来转去时，本土警戒局的一名密探几乎惊呆了：一辆车牌不明的403型汽车缓缓驶来，开车的竟是他已在情报处的档案里见过千百次的克列霍夫——这个克格勃在巴黎的老特务……汽车徐徐驶远了。帕克又重新出现。他虽被雨浇得像落汤鸡一样，却仍把雨衣挎在胳膊上。他不耐烦地看了看表。雨下得更大了。帕克也走进了这家小咖啡馆，喝葡萄酒的密探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登载赛马消息的报纸。这时，克列霍夫的汽车又慢慢地开了回来，他和帕克还没有接上头。“能当场逮获他们吗？”本土警戒局的密探心情紧张起来了。但是，正当这时，机会却被凡尔赛司法警察局的三个警察破坏了。他们从一辆警车上走下来。这辆警车装饰得几乎像消防车一样显眼，一看便知是警车。原来他们是来调查一件支票案件的……这时，克列霍夫突然消失了。对着轮胎气门吹气的密探意识到计划告吹了。虽然已查清帕克就是作案人，但“现场逮获”的行动计划却没有成功。

等他们下次接头时再逮捕吗？很可能在此之前他们就逃之夭夭了。第二天，在索赛街本土警戒局的总部，大家讨论着帕克的问题。警察重新翻阅了他的档案：这是个谨小慎微、安详宁静的文职人员。他杰出的才智吸引了苏联人。他在高等

师范学校时是让·索瓦尼亚格——后来任外交部长——的同期同学。索瓦尼亚格在他们中间名列前茅。帕克在师范学校结识的朋友中还有皮埃尔·布唐格和莫里斯·克拉韦尔。他们很喜欢帕克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帕克能背诵几千句诗句，喜欢开玩笑，还能唱几十首本世纪初的流行歌曲。狡猾而虚伪的帕克有着一个普通而又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年青时代的黄金般的梦想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当然，他也曾在勒内·科蒂、乔治·皮杜尔、约瑟夫·拉尼埃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办公室里任过职。然而，在他的故乡——索恩河畔夏龙的市政选举中，他却名落孙山。这样，他就对政界人士产生了某种鄙视的感情。一九五八年，他成了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一名专员，并在国防高等研究院讲课。他后来说：“教师、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职业对我来说几乎都是令人生厌的苦差事。”

自一九六二年十月以来，帕克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闻处的工作。后来，他娶了一个名叫维维娜的意大利女人。她是人类博物馆的人种学教员，研究撒哈拉地区人民宗教信仰的专家。

侦讯此案的负责人重新合上了卷宗，沉思了一会儿说：“明天就下手……不要再等了。”

星期一下午六点半，当帕克走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办公大楼时，在“王妃门”前被逮捕了。在笔记本里，他用“M3”的符号记着那次在弗什罗列没有实现的约会，这个符号也在另外一些日期旁出现。“我们知道你在为俄国人搞情报。”警察对帕克说，“我们认识这个‘M3’，你最好把一切都交代清

楚……”。

奇怪的是，帕克似乎排除了一切羁绊，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他那不为人们所知的重要事情终于被大家所识破，还是因为他最后摆脱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状态？

帕克舒了一口气，向那些惊骇的警察解释说，他终于能够领圣体^①了，而过去他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他靠说谎过日子。他闭着眼睛说：“在招供前，我想先领圣体。”可以说本土警戒局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于是派人坐汽车到马德伦教堂去请神父：“神父，请为一个特殊的教徒马上走一趟……”。帕克对警察说：“在这样一个甚至连墙缝里都有耳朵的地方，只有单独一个人在院子里忏悔才能保密”。于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奇特的场面：帕克侧着身子，在一个陌生人的耳旁轻声诉述着他的罪孽。接着，面对一张由办公桌改成的祭台做起了弥撒。一位警官作神父的助手，他小时候参加过唱诗班，但现在对此已生疏了。

帕克内心感到了宽慰。他离开了圣体龛，走向一张桌子，坐下来继续写他的忏悔。而参加过唱诗班的警官则要了一点三明治和啤酒，边吃边翻阅“国防部”的卷宗。

帕克写了十几张纸的交代，无一处涂改。他概述了自己二十年来的双重生活。

乔治·帕克的命运是在一九四三年刚刚解放的充满嘈杂

① 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这种仪式是根据《新约全书》中的有关故事，在举行弥撒时，由神父把一种无酵的面饼“祝圣”后，说这种面饼已变成耶稣的身体，即所谓“圣体”。教徒领食，称之为“领圣体”。

——译者

声与怨恨情绪的阿尔及尔市开始的。那时海军上将达尔朗刚刚在阿尔及尔被暗杀，而吉罗将军则想接替戴高乐。通过吉罗将军的朋友皮埃尔·布朗格的协助，帕克被任命为广播电台政治部主任，在安德烈·拉巴尔特身边工作。二十五岁时，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帕克当上了海军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法国驻外大使发回的电报和自由法国情报处的秘密报告都经过他的手。显然，就是在这种政治阴谋的气氛里，他开始对情报工作与秘密谈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帕克的医生艾梅克·伯恩斯坦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成员，曾进过集中营。一天晚上，伯恩斯坦把苏联驻阿尔及尔大使馆的随员亚历山大·库佐夫斯基介绍给帕克。当时苏联是西方的一个盟国，是反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象征。在阿尔及尔苍茫的夜色里，帕克同库佐夫斯基交谈得十分投机。

这个年青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善良的基督教徒、初入政界的和平主义者认为，德国被打败后，西方盟国就会转而反对苏联。此外，他对驻扎在阿尔及尔的美国人也深为不满。“美国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战败了，而且又穷困。他们的头头已在考虑把我们非洲排挤掉。而我却已爱上了非洲大陆。”他一想到这里，心情就十分沉重。他以圣·保罗为榜样，决心把西方从另一场灾难中拯救出来。在难以抑制的激情推动下，帕克去找他的朋友库佐夫斯基倾吐衷肠。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这位朋友：外交官写回的报告以及他所经手的电报——这还不算是最重要的情报。这并非是为了叛卖，据他说是为了使苏联人有所警惕，是“为了保卫和平”。

苏联人抓住了帕克易于冲动的特点，故意夸奖他：“我已

向我国政府作了汇报。这些情报很重要……我受权向你表示热烈的感谢。希望你继续这样为和平事业服务。”帕克一口咬住了这个镰刀状的鱼钩，于是一切都完了。

回巴黎后，帕克在他所有的职业活动中一直受到克格勃专家的操纵。在这些专家中，有个卓越的人物叫伊凡·阿瓦洛夫，他是苏联在欧洲谍报网的头目。一九六〇年柏林危机爆发时，乔治·帕克是负责研究西方可采取何种反击行动的小组成员。他再次对西方正在考虑中的措施的严重性和冒险性感到震惊……“为了保卫和平”，他向苏联人发出了警报。

“好，但怎样才能使我们的领导人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呢？”苏联克格勃的接头人巧妙地问道……“最好能有证据。”于是，帕克的行动又升了一级，他直接把那些说明西方能让步到何种程度的文件都交给了苏联人。八天后，赫鲁晓夫退让了。“多亏了你”，与帕克接头的一位克格勃军官说道。

这就是苏联人使用的诡计。他们使帕克相信，靠他一个人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是法国绝无仅有的世界和平的秘密谈判者。

开庭那一天，帕克的律师说，“帕克自以为是秘密的塔列兰①……”。

帕克在同政客与权贵们在一起时常常显得局促不安；但他却在暗中毫无顾忌地作弄着他们。他感到惬意，他的使命是多么崇高啊……他向苏联人提供了自己掌握的一切情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估计东方军事实力的文件；北大西洋公约

① 塔列兰(Talleyrand)，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大臣，有十分灵活的政治手腕和熟练的外交谈判技巧。——译者

组织部队装备计划；盟国联合军事演习的汇报；甚至还有法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发回的报告。

乔治·帕克并不只是偷窃文件，他非常聪明，他还为苏联人起顾问的作用，经常写一些介绍法国各机构以及法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材料。他还为莫斯科积极撰写了二百多份有关一些部长、议员、高级官员、外交官、军人和记者的传记。

他分析问题细致入微，这使他成为克格勃专家们的一个可贵助手。他成了一个拉·布吕耶尔^①式的人物。他提供的某些材料的确不算国家机密。在审讯时没有拿出这些材料来，因此，前来法庭作证的许多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认为，这些所谓的“重要情报”无非是把报刊上可见到的一些消息加以综合而已。但是，专家们看来，情况并非仅是如此……。

苏联人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帕克这个如此细心的人竟不会使用他们交给他的一件新鲜玩意儿。他对一架乌拉尔产的电子仪器感到手足无措，总是把机件搞乱。警察勒维尔格瓦在他写的题为《我选择了法国本土警戒局》一书中写道，克格勃曾交给帕克一架浅红的烟盒式微型电影摄影机，只要把这个灵敏而又不引人注目的摄影机在文件上一移动，就会自动产生光源；只要把机器来回移动三次便能把文件拍摄下来。这简直象小孩游戏一样，可是帕克却对付不了它。后来他把摄影机还给了苏联人，并说：“太复杂了。”

与他接头的那些心灵手巧的克格勃人员又教给他一种连幼儿园儿童都能掌握的复制方法：把一张感光纸放在文件上

① 拉·布吕耶尔 (La Bruyère)，法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他以言简意赅的分析能力而闻名。——译者

面，然后用《贸易统计年鉴》在上面一压就把文件复制好了，但帕克又失败了。所谓“空白复写纸”方法也没有能够使他感兴趣。这种方法是：把一张纸放到复写纸上，用铅笔轻轻在上面书写，然后毁掉第一张纸，在复写纸上随便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帕克把纸都揉破了，但还是没有成功。

只有一种方法，帕克接受使用了，那就是米诺克斯牌缩微胶卷照相机……克格勃交给他一些有磁性的微型胶卷盒，可粘贴在路牌后面。然而，帕克还是掌握不好。他出于诚意，也同意试用微点技术，以避免与苏联人过于经常的会面。这种方法就是把影印的文件缩小到一个直径仅为一毫米的微点，并把它隐藏在一张明信片的边角上。边角的位置可根据预先商定好的次序而变化。取出这一微点的方法与其说是一种间谍技术还不如说是昆虫学方面的一种技术：首先，把明信片的边角剪下来，浸入显影液中；然后把它放在灯下烤热，直到暴露出黑点。此时，要象外科大夫那样，小心翼翼地用一根针把黑点取下来，并用吸墨纸吸干；最后，把黑点放在由打火机的钢轮掩盖着的显微镜的透镜下，便可认读了……”。

然而，作了几次尝试后，帕克就表示不想再使用这种技术了。他更喜欢那种能发挥他专长的作法，如进行商讨和口头介绍情况。这种作法能使他强烈地感觉到他并不是窃取国家机密的叛徒，而是受人重视的顾问，是在单枪匹马地主持着一次决定世界命运的雅尔塔会议。后来，他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说：“由于我属于西方阵营，所以我力图使另一个阵营了解西方的意图和动机，以避免因某种误解而爆发战争。”就这样，帕克在巴黎先后同六个苏联克格勃人员——伊凡·阿瓦洛

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谢尔盖·加弗里晓夫、阿列克西·特丽谢娜、尼古拉·利桑克以及瓦西里·弗拉索夫——进行了紧张的联系。瓦西里·弗拉索夫现任苏联驻古巴大使，他在帕克被捕的第二天就匆忙离开了巴黎。

如果说某些同帕克接头的苏联克格勃人员，如阿瓦洛夫，与这位热情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共同语言的话，那么其他人只是把他看作为情报员，要他提供尽量多的情报。警察勒维尔格瓦写道，帕克每隔半个月就在一个地铁站附近同接头人会面，时间是早上九点或晚上八点。自一九五八年起，为安全起见，会面改在郊区进行。在紧急情况下，帕克在下午一点会见接头人，把文件交给他。文件很快被摄制下来，在三点钟就退还给帕克。

每当帕克要和他的接头人会面，他便预先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我是朱利安，想找瓦戈。”“你弄错了，先生，这里是苏联大使馆……”，一个“知情”的总机接线员回答说。当天晚上，帕克从家里出来时就会在人行道上碰见他的接头人。他若是擤鼻涕，那就说明一切都顺利。晚上九点，两个人在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寺院路左边人行道上再次会面。

为了约见乔治·帕克，瓦西里·弗拉索夫通常以某公司的名义给他寄一张名片。帕克在被捕的那天还收到一张这样的名片，上边写道：“从今天起，我们停止营业。”苏联人无疑已发现那次在弗什罗列的约会有些不正常，因而想停止和帕克接触，但这已太晚了。帕克被捕时，企图销毁的唯一东西就是他的“潜逃计划”。如发生战争、政变（据帕克说，苏联人很担心在法国发生法西斯政变）或一般性危险时，帕克应逃到意大利

利去。他本应于本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早上九点钟，腋下夹一份《费加罗报》，在罗马的圣玛丽娅教堂前出现，以恢复同苏联人的联系。

然而，这场冒险在索赛街结束了。帕克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乔治·帕克在警察面前仍泰然自若。但是他最终还是撕掉了自己的面纱，毫无保留地作了交代，并同意亲自把他已透露给苏联人的文件和其他文件区分开来。警察把大批文件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档案室里调来。帕克细心地把文件分成两堆，放到一张办公桌上。

当时，如果帕克拒不承认，他显然就不会被判以重刑。然而，在审理此案时，帕克自己给自己充当了检察官。他唯一感到牵挂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伊莎贝尔。她们十分喜欢帕克，并为他的案子终日惶惶不安。

帕克被监禁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和平事业服务，因而，他不感到案子的严重性。他在狱中写了一本书，题为《象小偷一样》。书中说：“根据刑法，我犯有叛国罪；而事实上，叛国的念头从未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有的人出于贪婪或憎恨而叛卖。然而，金钱丝毫不能使我动心。我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持友好、热情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应该保护他们的生命，因而要保卫和平。”

当帕克知道自己有掉脑袋的危险时，这个虔诚的教徒的思想更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他写道：“现在，主在我的心灵中出现了……我深信，他正在召唤着我，要我象他那样背上十字架……”。他说他唯一的痛苦是不得不离别自己的妻子，特别是自己幼小的女儿。